

# 钱谦益经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探究

吴海兰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钱谦益的经学思想体现出明确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他中年以后受归有光、宋濂及汤显祖影响,由早期对经学仅“粗通句读”转向倡导通经学古,大力批判俗学,强调以“反经正学”为“救世之先务”;明亡后虽放弃通经致用的主张,仍坚持“反经”——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的看法,其经学思想的转变在早晚期《春秋》学的论述中有比较明显的体现。钱谦益早期倡导以《春秋》学“谋王体而断国论”,对“红丸案”和《三朝要典》等作出了独到分析;明亡后,他的《春秋》学研究不再追求致用,而回归于纯学术的道路,因此对胡安国《春秋传》与《春秋》三传的评价也随之改变。

**关键词:** 钱谦益; 经学思想 《春秋》学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2015)04-0140-07

钱谦益(1582~1664)学兼众长,在经、史、文、释、道方面都有广泛涉猎,并取得突出的成绩。但无论其生前死后,学术界对其成就的关注、称赞与研究,基本集中于文学领域,其他研究方向则比较薄弱,其经学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就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sup>①</sup>。

## 一、钱谦益重经思想溯源

钱谦益的家族世授《春秋》,但目的主要是为了科考,如其祖父钱顺时在嘉靖己未(1559)“会试举《春秋》第一”<sup>②</sup>,父亲钱世扬中万历十九年(1591)副榜,于是“世授胡氏《春秋》”[1](P1634、1635)。钱谦益幼时也习读胡安国《春秋传》,同样“以举业为主,经义为客”[2](P1318),父亲曾授以万历十一(1583)年进士、邹守益之孙邹德溥的《春秋匡解》<sup>③</sup>,“期它日得出其门墙”[1](P876)。后来钱谦益参加乡试与会试,均受益于该书,因此钱谦益早年对经学不可能有深入的了解。

在忙于举业之余,他的精力主要集中于文学方面,仿效李梦阳、王世贞等前后七子派古文,“空同、弇山二

集,澜翻背诵,暗中摸索,能了知某行某纸。摇笔自喜,欲与驱驾,以为莫己若也”[2](P1347)。直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受嘉定四先生之一李流芳(字长蘅)的启发,钱谦益对七子古文的崇拜开始动摇。钱谦益对李流芳贬斥七子、追随唐宋大家的文学主张有所触动,但“心志其言而未敢信”;直至数年后阅读归氏文集,“识近代文章之谬,益服膺长蘅,以为知言”[3](P629)。通过李流芳的引荐,钱氏还得以结识唐时升、娄坚、程嘉燧等练川三老,从而“得归熙甫之绪言,与近代剽贼雇赁之病”[2](P1347),进一步加深了对归氏之学的了解。嘉定四先生作为归氏弟子,张扬师说,鼓吹通经学古,促使钱谦益逐渐与七子派决裂,“翻然大悔,屏去所读之书,尽焚其所为诗文,一意从事于古学”[3](P676)。归有光是明后期“通经学古”主张的重要倡导者,他反对屈经从传,也反对离经而讲道,以为通经即可明道,呼吁士人“通经学古”,因为“天下学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艺而可以空言讲论者也”

收稿日期:2014-09-12

作者简介:吴海兰(1976-),女,湖北麻城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与明清学术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明末清初的经学与史学”(项目编号:10YJC770099)。

①目前有川幸次郎《钱谦益与清朝经学》(载《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9号,1965年)、王俊义《论钱谦益对明末清初学术演变的推动、影响及其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2期),后该文收入氏著《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改题为《钱谦益与明末清初学术演变》、裴世俊《钱谦益和经学》(《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及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增订版)(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章“通经汲古的虞山之学”、山东大学2008年郭素红博士学位论文《明代经学的发展》第四章第四节《钱谦益之经学》等论著涉及钱氏经学的概貌、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治经方法、经学观、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

②据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3页)可查钱顺时中嘉靖三十八年己未科第二甲。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三〇《经部·春秋类存目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8页)称“是书专拟《春秋》合题,每题拟一破题,下引胡《传》作注,又讲究作文之法。盖乡塾揣摩科举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或坊刻伪托耶?”

[4] (P213)。钱谦益受嘉定诸君引导,“笃好震川先生之文”[2] (P729),“以一生师承在兹”[2] (P1335),逐步走上“訾毁太仓,诵法昆山”[5] (P673)的学术道路。

钱氏还提到宋濂对自己的影响“余为书生时,好为古文词。渔猎近代诸家气矜途泽之文,刻画自喜。中年读潜溪(宋濂号)震川集,少知持择,始改辕易辙,思自拔于流俗,望古人之质的而趋之。”[3] (P600~601)钱谦益对宋濂的关注缘自汤显祖。万历三十四、五年间,汤显祖勉励钱氏道“本朝文,自空同以降,皆文之舆台也。古文自有真,且从宋金华着眼。”钱谦益表示“自是而指归大定”[2] (P1558)。宋濂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为文主张“宗经”、“师古”,提出“文者道之所寓也。……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歿,道在六经。……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6] (P216~217)。钱谦益受其影响,“刻意学唐宋古文,因以及金、元元裕之、虞伯生诸家,少得知古学所从来,与为文之阡陌次第”[2] (P1347)。

在唐宋古文的发展历史上,宋濂昭示于前,归有光发扬于后,二人交相呼应,虽然思想主张并不全然一致,但在宗经师古、文道合一上确有诸多相似之处[7] (P125~126)。因此,汤显祖的劝勉很快得到钱谦益的认同。钱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作诗曰“金华绝学吴黄后,太仆遗编欧柳余。寄语吾徒须努力,张罗休效一囊渔。”“金华”句自注“金华谓宋文宪公,吴渊颖、黄文献,文宪之师也。”“太仆”句则自注“谓昆山归熙甫”[1] (P44)。该诗被称为钱谦益思想、学术和文学观念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8] (P52)。

汤显祖本人也是钱谦益敬重与仿效的对象。钱氏曾称许汤显祖在王世贞独霸文坛近二十年、排斥攻击唐宋古文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唐宋古学的独特价值:

嘉、隆之文,称秦汉古文词者争訾警曾、王,以为名高,二十年来日以颓敝,说者群起而击排之。排诚是也,而不思所以返于古。败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古文之复,岂可几也。义仍(汤显祖字)有忧之,是故深思易气,去耆割爱,而归其指要于曾、王。夫曾、王者,岂足以尽古文哉。其指意犹多原本六经,其议论风旨去汉、唐诸君子犹未远也。[9] (P1533)

汤显祖坚持鼓吹唐宋古文,“指意犹多原本六经”,虽然他与归有光一样只是一介寒儒,声名寂寞,以一人之力并不能挽狂澜,但是钱谦益正是沿着汤显祖与归有光重视古学的道路继续前行,试图推动时代风气的转变“自嘉靖末年,王、李盛行,熙甫遂为所淹没。万历中,临川(汤显祖)能讼言之,而穷老不能大振。仆

以孤生,谗闻,建立通经汲古之说,以排击俗学,海内惊噪,以为希有,而不知其邮传古昔,非敢创获以哗世也。”[2] (P1347)

## 二、钱谦益经学思想的发展

钱谦益没有经学专著,但他的相关经解文、序跋及论学书信都显示出中年以后对经学的兴趣相当浓厚,经学思想呈现出一个逐步发展的历程。

关于钱氏开始重视经学的具体时间,学界大致判定在天启二年(1622)[7] (P125)。但早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钱谦益就对明代的不良学风有所抨击“国家以经术取士,奉康侯(笔者注:胡安国字)如功令,句栉字梳,几无逗漏。第是经旨微而约,绪博而该。经生家童习白纷,涉其涯略,甚有不知《大全》为何种书者。……后世学者,株守臆说,窃窃然得一先生之言,曰《春秋》。《春秋》在是,政如管窥蠡测,奚当于大方者哉?”[10] (P859~860)后来随着结识练川三老,钱谦益逐步接受归有光对抗俗学、倡导通经师古的学说,并在其基础上提出更为深入的见解。

归有光所批评的“俗学”,主要体现在徒以记诵谋求功名,“以通经学古为拙”[4] (P151),认为其败坏人才、危害世道;钱谦益抨击的“俗学”范围有所扩大,他在天启二年(1622)与四年(1624)两次批驳“俗学”道:

夫今世学者,师法之不古,盖已久矣。经义之敝,流而为帖括,道学之弊,流而为语录。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谓俗学也。俗学之弊,能使人穷经而不知经,学古而不知古,穷老尽气,盘旋于章句占毕之中,此南宋以来之通弊也。弘治中,学者以司马、杜氏为宗,以不读唐后书相夸诩为能事。[1] (P73~74)

古之学者,九经以为经,注疏以为纬,专门名家,各师师说,必求其淹通服习而后已焉。……自儒林道学之歧分,而经义帖括之业盛,经术之传,漫非古昔。然而胜国初之儒者,其旧学犹在,而先民之流风余韵犹未泯也。正、嘉以还,以剿袭传讹相师,而士以通经为迂。万历之季,以缪妄无稽相夸,而士以读书为讳。驯至于今,俗学晦蒙,缪种胶结,胥天下为夷言鬼语,而不知其所从来。[1] (P853)

钱谦益眼中的“俗学”则囊括经义与道学二者的末流,前者为“帖括”,即科举应试类“俗学”,归有光对之已有批判,而后者道学类“俗学”是归氏所未曾触及的。这与钱、归二人对宋学的认识不同有关。归有光对宋学持基本肯定态度,如他称“窃谓经学至宋而大明”[4] (P150),“宋之大儒,始著书明孔、孟之绝学,以辅翼遗

经。至于今, 颜之学官, 定为取士之格, 可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矣”[4](P213)。具体到朱熹学说, 虽不无微词, 但总体还是正面评价: “或时有过于离析附会者。然其大义, 固不谬于圣人矣。”[4](P222~223) 而钱谦益对宋学则多持批评态度, 如他称“俗学”“使人穷经而不知经, 学古而不知古, 穷老尽气, 盘旋于章句占毕之中, 此南宋以来之通弊也”, 而且宋代儒林与道学分途, 直接导致“经义帖括之业盛, 经术之传, 漫非古昔”。

崇祯十二年(1639), 钱谦益在《新刻十三经注疏序》中有进一步的深入阐释。他考察了经学的发展历程, 称宋代发生了巨变: 熙宁中, 王安石凭藉一家之学, “创为新义, 而经学一变”[1](P850)。《三经新义》颁行于天下, “一时学者无不传习, 有司纯用以取士。……自是先儒之传注悉废矣”[11](P374~375)。学者“视汉儒之学若土埂”[12](P1094), 汉唐的传注经学被宋代的义理之学所取代。此后, 朱熹折衷诸儒之学, 集为传注, “而经学再变”, 理学家们“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 扫除章句, 而胥归之于身心性命”。后世更进而以讲道为能事, “其言学愈精, 其言知性知天愈眇, 而穷究其指归, 则或未必如章句之学, 有表可循, 而有坊可止也”。可见宋明理学虽然后出转精, 在天道性命等义理思辨方面颇有创获, 但并不意味着它全面超越了汉唐的章句之学。元代朱子学说更成为立国之本, 《宋史》中特设《道学传》, 记载周、程、张、朱门人, 以体现对继承孔孟道统理学大儒的推崇。虽然《宋史》也设有《儒林传》, 但经学家的地位与理学家无法相提并论。钱谦益指出这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儒林与道学分, 而古人传注、笺解、义疏之学转相讲述者, 无复遗种。此亦古今经术升降绝续之大端也。”[1](P850~851) 不仅如此, 明代的《五经四书大全》还直接导致汉唐注疏被废, “再变之后, 汉、唐章句之学, 或几乎灭熄矣”[1](P850)。此后陈献章、王阳明等人鼓吹心学, 导致“举世胥变为俗学”: “自儒林道学之术分歧于儒家, 而古学一变, 自江门(笔者注: 陈献章别号江门渔父)、姚江之学侧出于经术, 而古学再变。于是乎封鄙之以制科之帖括, 淪乱之以剽贼之词章, 举世胥变为俗学, 而江河之流不可复返矣。”[2](P850~851)

钱谦益对“俗学”予以猛烈批判, 是因其认为学术与政治关联密切。天启四年(1624) 他已抨击嘉靖、万历以来“俗学晦蒙, 繆种胶结, 胥天下为夷言鬼语, 而不知其所从来。国俗巫, 士志淫, 民风厉。生心而发政, 作政而害事, 皆此焉出”[1](P853)。他认为“俗学”的盛行导致士风淫僻、耻尚失所, 民风世态江河日下, 纲纪凌夷, 进而影响到政局的稳定。崇祯六年(1633), 钱

谦益重申经学与国政休戚相关。他以《春秋》学为例, 比较了汉、宋时期的学术与政治, 说三代以后, 享国长久者莫如汉, “当其盛时, 政令画一, 经术修明”。董仲舒、萧望之等定大议、断大疑, 均援引《春秋》为据, “何其盛哉!”宋代自王安石推行新学, 科举考试不以《春秋》取士, “遂驯致戎狄乱华之祸, 没世而不复振”[1](P876)。将《春秋》被废与北宋亡于异族相联系, 这种观点失于偏颇, 但类似的思维在中国古代颇为盛行。汉武帝时期确立经学官方统治地位的根本原因, 是欲以六经来统一社会思想, 用思想统一来维护政治统一[13](P78~79)。这种做法后来得到历代王朝的效仿。王安石主持编纂《三经新义》, 其实也是如此, 只可惜变法很快失败而无法推行, 其新学与变法都遭后人诟病。钱谦益正是从这个角度对其作出了负面评价。钱氏在汉宋两朝经学与政治对比的基础上提出:

经学与国政, 咸出于一, 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 人异学, 国异政。公卿大夫, 竞出其聪明才智以变乱旧章。晋之刑鼎, 鲁之丘甲田赋, 郑之竹刑, 纷更多制, 并受其敝。又其甚也, 获雁之鄙人, 假田弋之说以干政事; 而振铎之后, 不祀忽诸。繇此言之, 经学之不明, 国论之不一, 其关于存亡治乱之故, 犹病之著于肌表, 诊视者可举目而得之, 不待医和及缓而后知其不可为也。是可视为细故哉? [1](P877)

他认为经学统一可使思想观念一致, 政治上的统一也就轻而易举了, 那么就可实现社会稳定、天下太平; 反之, 人异学、国异政, 变乱日起。

此外, 崇祯十二年(1639), 钱谦益将“俗学”盛行与“夷狄寇盗之祸”相联系:

经学之熄也, 降而为经义; 道学之偷也, 流而为俗学。胥天下不知穷经学古, 而冥行撞墙, 以狂瞽相师。驯至于今, 轻材小儒, 敢于嗤点六经, 皆毁三传, 非圣无法, 先王所必诛不以听者, 而流俗以为固然。生心而害政, 作政而害事, 学术蛊坏, 世道偏颇, 而夷狄寇盗之祸, 亦相挺而起。[1](P851)

此年, 李自成农民军闯入河南, 因当地大旱, 斛谷万钱, 饥民争相参加义军, 人数达50万, 震惊朝野。关外的清政权也日益强盛, 崇祯十一、十二年间, 清军入关达半年, 深入二千里, 攻占多处城池, 俘获人口四十多万。面临这种内忧外患的困境, 钱谦益虽身不在朝廷, 也深感危机四伏。他认为政治、民族危机出现的根源应溯源于学术, 因学术影响人心、人心影响社会治乱, 进而影响国运。明末经学衰落致使无知小儒“敢于

嗤点六经,皆毁三传,非圣无法”;“俗学”流行,导致时人“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学术蛊坏,世道偏颇”,“夷狄寇盗”就乘机兴起。既然政治危机的源头在于学术败坏,那么要救世,必须回归学术正途。因此他说:

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经而已矣。诚欲正人心,必自反经始,诚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圣天子广厦细旃,穆然深思,特诏儒臣,是正遗经进御,诚以反经正学为救世之先务,亦犹二祖之志也。[1](P851~852)

钱谦益主张“反经正学”为“救世之先务”,在明末岌岌可危的政局下,显然是书生的迂阔之论。四年后,明王朝就无可挽回地灭亡了。

但钱谦益“反经”的主张并未因明王朝的崩溃而放弃,如其在顺治初年所撰的《李贯之先生存余稿序》中,就曾从明末经学衰落的角度总结亡国原因:

宋、元以来,学者穷经读书,确有师承,幼而学,壮而成,老而传端序。经纬精详,次第具在。宋学士之志曾鲁者,如金科玉条,不可更易。世降道衰,教学偏背,烦芜之章句,熟烂之时文,剽贼傭赁之俗学,耳食目论,浸淫熏习,而先民辨志敬业之遗法,不可以复考矣。迨其末也,世益下,学益驳,谰闻曲见,横鹜侧出,聾瞽狂易,人自为师。世所号为魁士硕儒,敢于嗤点谏诤,镌夷经传大书浓抹,以典训为戏剧。驯至于黄头邪师,弥戾魔属,充塞抗行,交相梟乱,而斯世遂有陆沉板荡之祸。[2](P784)

到顺治十二年(1655),钱谦益在《答徐巨源书》中仍然坚持“反经”的论调,虽然此时不再将“反经”与世务联系,而集中从学术的角度谈论。他的“反经”主张是针对“末学”之弊而提出的,他认为末学之失其病有二:“一则蔽于俗学,一则误于自是。”“蔽于俗学”是指学术研究中不知“爬搔搜剔,溯本穷源”,而惑于历代传注之学,导致“经学乱于蛙紫,史家杂于秕稗,众表竞指,百喙争鸣”。“误于自用”则是“逞臆无稽,师心自用”,预存先入之见,自以为是。要克服二者的弊端,钱氏认为只有“反经”一途:

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惟有反经而已矣。何谓反经?自反而已矣。吾之于经学,果能穷理析义、疏通证明,如郑、孔否?吾之于史学,果能发凡起例、文直事核如迁、固否?吾之为文,果能文从字顺、规摹韩柳、不循规矩、不流剽贼否?吾之为诗,果能缘情绮靡、轩翥风雅、不沿浮声、不堕鬼窟否?

“反经”是指无论从事何种学术研究,都要以汉唐

经典为楷模。具体到经学,“必以汉人为宗主”,因为“六经之学,渊源于两汉,大备于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诚亦有之,然其训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义,去圣贤之门犹未远也”。当然,汉代经学并非尽善尽美,唐宋及近代经学也有其可取之处,“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庶几圣贤之门仍可窥,儒先之铃键可得也”[1](P1706)。顺治十八年(1661)钱谦益八十岁时,他还坚持“余每劝学者通经,先汉而后唐、宋。识者当不河汉其言”[1](P1516~1517)这可视为其晚年定论。

三、钱谦益经学思想的变化:以《春秋》学研究为例  
钱谦益的经学思想,大概以明亡为界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前期以通经致用为主,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后期强调回归学术研究本身,这在他的《春秋》学研究中有所体现。钱谦益认为《春秋》因具备“刑赏”功能,在六经中最为独特。“六经,圣人治世之书也。《春秋》独佐以刑赏,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凛然万世充钺焉。”[10](P859)该书“万世充钺”的功能,在汉代董仲舒、何休与宋代胡安国等人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昔者汉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狱,断国论。董仲舒作《春秋决事》,比朝廷有大议,使使者就其家问之,其对皆有法。何休以《春秋》驳汉事,服虔又以《左传》驳何休,所驳汉事六十条。故曰:属词比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当南渡之后,惩荆舒之新学,闵靖康之遗祸,敷陈进御,拳拳以君臣夷夏之大义摩切人主。[1](P889~890)

董仲舒、何休、胡安国等人是借《春秋》学以致用的典范。

钱谦益的通经致用观念,在崇祯年间他为吴希哲《麟旨明微》及李永年《左汇》所作的序言中有明确的阐述。他说吴希哲“诚欲使天下学者通经学故,谋王体而断国论,以董子、胡氏为仪也”[1](P889~890)。崇祯十一年,他称赞李永年“使后之从事者,繇胡以溯左,繇经以溯传。繇是以穷经术焉,断国论焉”。吴、李二人是否有此深意,本文存而不论,但钱氏借此表达了他试图通经致用、解决现实问题的理想。“自荆舒之新学行,以《春秋》为腐烂朝报,横肆其三不足之说,而神州陆沉之祸,有甚于典午(笔者注:指晋朝)。流祸浸淫,迄于今未艾。居今之世,明《春秋》之大义,阐定、哀之微词,上医医国,此亦对症之良剂也。”[1](P878)钱谦益从新学贬低《春秋》的角度来分析北宋灭亡的原因,并指出其恶劣影响至今未息。崇祯初年在东北日渐强盛的清政权已越来越成为明王朝的威胁,钱氏主张在此形势下“明《春秋》之大义,阐定、哀之微词”,重视《春秋》学

以便医国救世。

钱谦益“谋王体而断国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崇祯元年撰写的五篇《春秋论》中。前三篇辨析《春秋》中的赵盾弑君与许止弑父案,钱谦益都以《左传》为主要依据,并结合其他类似历史事件作为旁证,论证赵盾弑君与许止弑父均为事实,否定了《公羊传》与《谷梁传》的记载。钱谦益重视这两宗案件,是为分析明末“红丸”等案作铺垫。万历四十八年神宗卒,光宗即位,郑贵妃献美女八人,光宗过度纵欲而患病,李可灼连进二粒红丸诊治,光宗随之死去。当时朝廷内外皆以为中有情弊,但首辅方从哲却拟旨赏赐李可灼,于是议论蜂起。给事中惠世扬以许世子止不尝药为例,认为方从哲对光宗服红丸致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礼部尚书孙慎行也以许止弑君案为例,援引大义对方从哲进行申讨,认为其应该引剑自裁,至少也要主动自首[14](P6308)。邹元标支持孙氏道“元辅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即谓无其心,何以自解于世?”[14](P6305)高攀龙“引《春秋》首恶之诛,归狱从哲”[14](P6313)。诸人都申明红丸案乃《春秋公羊传》昭公十九年所载“许世子止弑其君”历史的重演,议方从哲无君之罪。

钱谦益对“红丸案”有不同的认识,他并不赞成以《春秋》断狱。西汉武帝尊公羊家,因此公羊学大兴,多引《春秋》决狱。钱谦益评论道“朝廷有大议,儒者往往引经谊裁断,一言而决。至使人主宰相,相顾叹息。于经术则善矣,以此为折狱之准,则非也。”[1](P749)以《春秋》决狱断罪的准则是“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15](P104)《春秋》决狱鼓励司法者抛开法律的条文,以《春秋》的“微言大义”来衡量人主观心态的善恶。但《春秋》并非法律条文,只能撷其片言只语作为依据,这就导致了“片言折狱”现象的产生。所以《春秋》决狱与按当时法律条文决狱存在极大距离,甚至形成完全相反的结果[16](P148)。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钱谦益否定《春秋》决狱的认识值得肯定。他特别指出在唐宋法律日渐完备的条件下,再引《春秋》断狱更是荒谬“唐、宋以后,各有律法,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著为令。顾欲引《春秋》之义,断后世之狱,是犹禁奸盗以结绳,理文书以科斗,岂不缪哉!”[1](P749)事实上,到唐代《唐律》产生之后,儒家经义全面完成了对成文法的改造,法律成为经义的载体,《春秋》决狱遂失去其功效而消亡[17](P224)。

不过,钱谦益承认汉代引《春秋》断狱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汉世去春秋未远”,而明代距春秋已千余

年,如果还试图以许世子止之狱辞传本朝之律令,他认为太过迂腐。他提出如要借鉴前朝审判类似案件的做法,那么参考唐代宪宗事即可:“世宗之升遐也,与唐宪宗相似,柳泌、僧大通付京兆府决杖处死,方士王金等之议辟,宜也。李可灼之事,与柳泌少异,以和御药不如法之律当之可也,当国大臣,则有穆宗贬皇甫铸之法在。”[1](P749)唐宪宗晚年,贪图享乐,妄求不老,下诏搜求方士为他炼制长生药。宰相皇甫铸与金吾将军李道古推荐山人柳泌及僧大通等为宪宗配长生药,宪宗服药后性情变得暴躁多怒,宦官陈弘志等人害怕无罪被杀,以致弑杀宪宗。唐穆宗继位,立即将柳泌及僧大通处死,并将推荐者李道古贬职外调。钱谦益认为“红丸案”可以参考唐代的处置办法,如李可灼处以“和御药不如法”之罪,“当国大臣”方从哲则应被贬。他对“红丸案”的结论如下:

天启进药之狱,蒙有猜焉。进药决之禁中,阁臣不为药主,一也。光宗寝疾弥留,非以红丸故,奄弃万国,二也。舍崔文昇而问李可灼,三也。谷梁子曰:于赵盾见忠臣之至,于许世子止见孝子之至。儒者相沿服习,以为精义。执此以断斯狱,则过也。

他认为进药方案出自内宫,方从哲并不知情;光宗死亡原因在于病重,并非死于红丸;追究罪魁祸首不应舍崔文昇而问李可灼[18](P644~650)。但此时若试图仍以《春秋》作为评判此事的标准,已是大谬。

钱谦益还对《三朝要典》颠倒是非黑白的记载进行了激烈抨击。《三朝要典》由“移宫案”时李选侍的心腹太监魏忠贤指使顾秉谦等人纂修,歪曲史实,充满了对东林党的诋毁,全盘推翻此前“挺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结论:指张差确系疯癫,争“挺击”是陷万历帝于不慈、陷光宗于不孝,光宗因哀慕神宗而致疾;移宫为东林党人贪图“定策之功”,逼迫凌辱先帝之爱妃(李选侍),离间皇家之骨肉,使得皇帝不能为纯孝。《三朝要典》替光宗、神宗作了一番洗刷,粉饰了皇室的亲爱及光宗、熹宗的孝思,从而争取到了熹宗皇帝的支持。该书撰写神速,四月即成,熹宗亲自制序,并颁行天下[19](P51)。《三朝要典》修成后,又启动了对《光宗实录》的修改,刊削与《三朝要典》抵牾的内容。钱谦益追溯出阉党分子给三案翻案的理论源头——西汉的耿育。汉成帝暴毙后,司隶校尉解光上奏太后,称成帝与其他妃子曾育有子嗣,但均因赵氏姐妹而死于非命,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太后有意依法严办,但她也担心深究会使成帝的私生活暴露于天下。郎官耿育在这种情况下上书,引经据典,把荒淫无耻、谋杀亲子的成帝

装扮成具有远见卓识、深谋远虑的圣贤君主,还把故意断绝子孙说成是为了杜绝女主专权,并反对追究赵氏,避免“暴露私燕”、“诬污先帝”[20](P3998)。钱谦益称耿育之言虽然“皆应经谊”,但可谓“佞人之尤”:“近代小人,誉挺击、移宫之事者,曰慈曰孝,上痛山陵,下惜宫禁,皆耿育之议为之祖也。”当然,钱氏揭露、抨击的重点乃在当朝“援据经谊”“倡邪说以摇国论”的种种恶行“既而曰《三朝要典》,允称信史。光庙《实录》,亟须刊定。阐累朝之慈孝,洗君父之恶名,莫不援据经谊,依附忠厚。庄生有言:儒以诗礼发冢,其是之谓乎?”[1](P750)

钱谦益在崇祯初年所倡导的“谋王体而断国论”思想,其实与崇祯皇帝上台后剪除阉党分子、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钱谦益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入阁执政,施展平生抱负,天启年间的党祸导致东林领袖几乎丧失殆尽,幸存下来的钱谦益俨然成为东林党魁。不料钱谦益遭到政敌周延儒、温体仁的攻诘而被革职回籍,周延儒自己也被温体仁排挤归乡。崇祯十四年,钱谦益与复社张溥策划周延儒复出为首辅,希望借机得到荐举,却再次失败[8](P71~76)。南明福王政权时期,钱谦益为了功名竟然与阮大铖同流合污,但仍然进退维谷。清军南下围困南京,则又以南明礼部尚书身份与其他人一起主动迎降清军。顺治三年,钱谦益在北京被清廷授予秘书院学士兼礼部右侍郎的虚衔,根本不受重用,钱谦益由此感到心灰意冷,于是告假还乡[8](P137、150)。经历过政治上的一波三折,甚至变节投降清军,都未能实现封侯拜相的夙愿,钱谦益不得不放弃“谋王体而断国论”的思想,其《春秋》学的研究不得回归于纯学术的道路。通过比较早晚期其对胡《传》与《春秋》三传认识的不同,可以加深对钱谦益经学思想变化的了解。

万历三十九年(1611),钱谦益为《春秋胡传翼》作序,对胡《传》与《春秋》三传有截然不同的评价。他指出《春秋》三传“业擅专门,训诂成癖,大义盖阙如也”,存有明显的不足;直至胡安国著《春秋传》,“会宣尼之微旨,捃三传之绪言”,而且吸收了郑玄、杜预以来诸名家的成就,因此虽不尽合经义,“总之褒贬予夺,不离笔削宗旨,所谓史外传心者非耶”[10](P859)。崇祯年间,钱谦益为《麟旨明微》作序,称胡《传》为明三百年“持世之书”:

胡文定生当南渡之后,惩荆舒之新学,闵靖康之遗祸,敷陈进御,拳拳以君臣夷夏之大义摩切人主。祖宗驱斥胡元,复函夏之旧。《春秋》传解,断以文定为准。盖三百年持世之书,非寻行数墨,以

解诂为能事者而已也。

他认为胡《传》能被立为科举文本,与明统治者驱逐蒙古人、恢复华夏政权有关。该书在明代对于维持世道人心颇有裨益,不可以等闲的解诂类书籍视之。

顺治十三年,钱谦益在《与严开正书》中言及胡《传》时,态度已不觉发生了改变。胡《传》在明初本与张洽《传》并行,后来竟独行,钱氏指出其原因是“以其尊周攘夷,发抒华夏之气,用以斡持世运,辅张金、元已来驱除扫犁之局”,但他已不认可这种解经方式,表示“非以为经义当如是也”。他称许弟子严开正对胡《传》“发凡起例,条析理解,如秦越人之诊病,洞见其肺腑症结,攻伐疗治,了如指掌”。“胡氏弃灰之琐法,一切平亭。”[2](P1316~1317)可见,此时钱谦益已意识到胡《传》的不足,虽然这个认识可能来自于严开正的研究。

钱谦益对胡《传》由全盘肯定到有所批评的转变,导致他对《春秋》三传的认识也随之改观。万历三十九年时,他称三传训诂成癖,大义阙如;到崇祯时期,钱氏对《左传》已多肯定之词,如崇祯元年的《春秋论》中关于赵盾弑君与许止弑父案,他都是采信了《左传》的相关记载,称“左氏之记事也核矣”[1](P746),而对《公羊传》《谷梁传》多有驳斥。崇祯十一年的《左汇序》中,他说“文定之书,取于左氏者十八,取于《公》、《谷》者十二。盖左丘明亲见圣人,高与赤则子夏之及门,其发凡取例,区以别矣。”[1](P878)钱氏对三传已不再持贬斥态度。顺治十三年时,钱谦益表示“窃谓左丘明亲授经于仲尼,公、谷皆子夏之门人。以宗法言之,左氏则宗子也,公、谷则别子之子也。”并简述了自汉以来的《春秋》学史:立于刘歆,释于杜预,至孔颖达而臻于完备。可惜唐代学者欲舍传以求经,于是“入主出奴,三传皆茫无质的,而《春秋》之大义益晦”[2](P1316~1317)。元代黄泽、赵汭师徒主张回到三传,特别是回到《左传》以理解经义,钱谦益称许黄泽“独知宗《左氏》以通经”,而赵汭的《左氏补注》《春秋集传属辞》诸书,“殆高出宋、元诸儒之上”,可惜多为未成之书。明人熊过撰《春秋明志录》,专门纠《春秋》诸传之失,颇多平允之论,资料翔实,但也有凿空不根之说。

诸传都有不足之处,该如何继续推进《春秋》的研究?钱谦益提出“当以圣经为经,《左氏》为纬,采集服、杜已后迄于黄、赵之疏解,疏通画一,订为一书,而尽扫施巧卢仝,高阁三传之臆说。”[2](P1316~1317)钱氏在稍后的《华仲通诗文集序》中说左丘明本受经于孔子,而《论语·公冶长》记载孔子说“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原因在于《左传》通过发凡起例、褒贬劝戒,“使

《春秋》大义 炳日星而沛江河”[2](P817),其功甚伟,因此左丘明可谓《春秋》的功臣。此时,钱谦益已几乎不再提及胡安国的《春秋传》了。

钱谦益前期《春秋》学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强调恢复通经致用的传统,“谋王体而断国论”,这与其政治上企图入阁执政的追求密切相关,但随着他在政治经历上的一系列失败,特别是主动降清不仅未能取得理想的功名富贵,反而还留下千古骂名,让其心灰意冷,于是导致他对经学的关注点由致用转向对经义本身的探讨。这种转变与其晚年“反经”思想中倡导“穷理析义、疏通证明,如郑、孔”[2](P1314)的主张显然是一致的。

作为“四海宗盟五十年”[21](P256)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在当时的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凡四方从游之士,不远千里,行滕修费,乞其文,刻系牲之石,为先世光荣者,络绎门外。”[22](P1)因此,早期他对俗学的抨击,对扭转明中叶以来的不良学术风气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并成为清初出现的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波澜壮阔的经世致用思潮之先导[23](P50);晚期他从通经致用转向探讨经义本身发清初学术转换之先声,而且成为其后继起的汉学主张的先导[24](P52),这都充分体现了钱谦益在明末清初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 参 考 文 献

- [1](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A].钱牧斋全集(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2](清)钱谦益.牧斋有学集[A].钱牧斋全集(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3](清)钱谦益.牧斋外集[A].钱牧斋全集(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4](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5](清)黄宗羲.南雷诗文集[A].黄宗羲全集(十)[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 [6](明)宋濂.宋学士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7]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增订版)[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 [8]裴世俊.四海宗盟五十年:钱谦益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 [9]汤显祖.汤显祖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10](清)钱谦益.牧斋集补[A].钱牧斋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11](宋)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2](宋)王应麟.困学纪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3]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 [14](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5](汉)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6]马作武.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修订)[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
- [17]涂世虹.中国法制通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 [18]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下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 [19]杨艳秋.《明光宗实录》《三朝要典》的编修[J].史学史研究,1998(4).
- [20](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1](清)黄宗羲.南雷诗历[A].黄宗羲全集(十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 [22](清)钱谦益.绉云楼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3]王俊义.论钱谦益对明末清初学术演变的推动、影响及其评价[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2).
- [24]黄爱平.论明末清初学术向传统经学的回归[J].中国文化,第二十一期,2004(6).

(责任编辑 陈朝云)